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杜运威.民国词之现代性考察——以彊村仙逝事件和庾信意象为例[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45(3):90-95.

民国词之现代性考察

——以彊村仙逝事件和庾信意象为例

杜运威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

摘 要:探究民国词现代性问题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理清民国词创作层面的特质。相比于宏观视角的归纳总结,立足文本的公共事件及意象运用等微观视角,更有利于洞悉民国词的传承路径与创新表征,为其现代性特征的探究提供新思路。词坛盟主朱祖谋仙逝后,围绕此事的相关词作在抒发友谊之情和概括历史功绩的共性基础上,扩展成遗民与新民两大群体心态的集中展示。此书写差异,说明创作者的身份定位与政治认同,是判断民国词现代性的重要衡量标准。庾信典故因抗战时期区域政治的复杂性而呈现出不同的寓意,国统区词人以此强调“乡关之思”基础上抗战必胜的信念,沦陷区作家则以此寄托“倡家强聘”处境下的忠贞气节。庾信意象内涵的丰富与拓展,恰是民国词走向创新之路的主要表现。基于以上微观考察,民国词现代性特征的探究路径,将会变得更加明朗。

关键词:民国词;现代性;彊村仙逝;庾信典故

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 (2022)03—0090—06

文学现代性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学者不懈追问的根本目的,是想确立古今文学的界限,彰显现代文学的独特性标志。这对文学史的梳理与建构,是十分有意义的。基于这一前提,晚清民国古典文学领域也涌现出诸多“现代性”“现代转型”等同类话题的相关成果。单以词学而言,就有朱惠国、曹辛华、陈水云等众多学者参与讨论。然据笔者梳理,其对词学现代性的研究,大都集中于词话批评、词学思想、文献史料、研究方法等方面,一定程度轻视了词作本体研究的同步推进,目前仅见马大勇《晚清民国词史稿》、李剑亮《民国词的多元解读》两部专著以及数篇论文;而民国词之现代性问题,恰恰是廓清其与宋、元、明、清词界限,彰显其独立特征的重要议题。

马大勇先生指出,朱祖谋(1857~1931)的去世,标志着“古典词时代的终结”^{[1](P271)}。有关“古典词”的论点,很容易引起人们追问“现代词时代”开始于何时。若粗率地将其定为 1931 年,则不免有失学理性,毕竟文学的发展不可能聚焦到某个人的单线条推进上。我们也可以从词史角度申论民国词是对风云复杂的民国史的反映,继而将其框定为 1912 至 1949 年;然而这种时间角度的划分,根本无法彰显民国词的主要特征,当然也无法解决民国词现代性的问题。于是,学者在“民国”概念基础上开展更详细的切割,如曹辛华的三段论(1912~1923,1924~1937,1938~1949)、朱惠国的三期法(1912~1927,1928~1936,1937~1949)^①。这种阶段性发展差异

收稿日期:2021-1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抗战时期词坛研究”(20FZW066)

作者简介:杜运威(1989—),男,江苏连云港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 20 世纪旧体诗词研究。

① 曹辛华《民国词史综论》提出民国词三段论,分别是 1912~1923,1924~1937,1938~1949,参见《民国词史综论》,《2006 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朱惠国在《民国词研究的现状及其思考》中也提出三期法,但时间划分稍有不同,分别是 1912~1927,1928~1936,1937~1949,参见《现代中文学刊》,2014 年第 6 期。

的概括，确实有利于梳理民国词史的发展脉络，但以某某时间为转折标志的探讨，并不是解决民国词现代性问题的有效突破口。我们也可以顺着“诗界革命”的思路，去晚清民国词中寻觅新事物、新思想对词坛的冲击，乃至探索南社词中“革命”和“民族主义”的具体表现，以及抗战词中宣扬民族精神、承担历史使命的重大叙事等等，但这似乎都难以归纳出其创作层面现代转型的共性特点。

因此，我们不妨转换视角，抛弃时间切割的历史思维，也撇开文学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宏观概括套路，从文本中表现出的作者立场和素材使用等微观角度入手，分析民国词对古典诗词的传承与开拓。比如前者可从遗民和新民的身份定位切入，将词人作品中对民国是否认同作为主要的衡量标尺，以之确立民国词新旧转型的标志；后者则可以庾信典故的运用为切入点，分析不同时代、不同区域词作运用这一典故时的内涵差异，以进一步彰显民国词之独立性和创新性。通过这种词文本的具体分析，民国词现代性的产生与发展或许会明朗得多。为了更深入地走进文本以及更精确地把握文献，本文以民国词坛重要组成部分的抗战词坛（1931～1945）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展开全面考察，以反观民国词之现代性特征。

一、民国词中的遗民故国之思与新民家国之叹

文学界对悼亡词有约定俗成的理解，即其对象只能是妻妾。^{[2] (P1)} 本文将悼念恩师长辈、同侪好友、弟子后生等妻妾以外的作品统称为悼挽词。本文之所以选择悼挽词为研究中心，是因为宋代及明末清初，还未大量出现用词来悼挽友人的现象，人们通常用文章或诗歌等来书写此类严肃话题。这意味着尽管词体意识不断加强，但仍没有拓展至此范畴。经过清词的全面深化，至晚清民国时期，词体观念进一步改变，诗歌几乎所能表现的题材、范围，词都可以涉猎。悼挽词的频繁出现就是重要标志。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一特殊题材，可清晰审视民国词人政治身份的基本立场。民国时期有几个重要的群体性悼挽事件，如陈三立、朱祖谋、吴梅、张自忠事件等。民国词学领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朱祖谋。民国词坛盟主彊村仙逝，意味着古典词时代的终结。当此之时，不同身份作者的悼挽之词中，存在着许多值得挖掘的情感寄托与期待。以此事件为切入口，可以更深入

地窥探民国词传承与新变情况，亦能透视民国词的现代性特征。

朱祖谋（1857～1931），原名孝臧，字藹生，一字古微，又作古薇，号沅尹、彊村，浙江湖州人，著《彊村词》等。其晚年活跃于苏沪一带，被公推为词坛盟主。彊村去世消息甫出，震动文坛，众多大家为之填词悼念。就文本分析，其大体有两种追悼模式。

其一，回顾与主人交往经历，抒发友谊之情。如陈洵《木兰花慢·岁暮闻彊村翁即世，赋此寄哀》：

水楼闲事了，忍回眸，问斜阳。但烟柳危阑，山芜故径，阅尽繁霜。沧江，悄然卧晚，听中兴琶笛换伊凉。一暝随尘万古，白云今是何乡！

相望，天海共苍苍，弦敛赏音亡。剩岁寒心素，方怜同抱，遽泣孤芳。难忘，语秋雁旅，泊哀箏危柱暂成行。泪尽江湖断眼，马塍花为谁香？^{[3] (P376～377)}

陈洵原本在岭南并无声名，生活十分贫困，因好友李雪芳北上出演机会，得其介绍与朱祖谋相识。朱氏评其《海绡词》“神骨俱静，此真能火传梦窗者”^{[4] (P42)}，并将其刻入《沧海遗音集》，且荐其为中山大学教席。此举瞬间改变了陈洵的人生轨迹，因而其视彊村为“平生第一知己”。上文中“弦敛赏音亡”“马塍花为谁香”皆由此发，“泪尽江湖断眼”之悲痛极有感染力，堪为彊村悼挽词压卷之作。

其二，概括其平生功绩，给出准确历史定位。彊村为“晚清四大家”之一。王鹏运去世后，其更超越郑文焯、况周颐，而跃为词坛盟主。其《彊村语业》素有六百年来最得梦窗精髓的超高评价。诸如“冠绝一代”^{[5] (P1959)}、“词流之大殿”^{[5] (P1963)}、“清季词学之大成”^{[5] (P1967, 1970)}等美誉，其都是承受得起的。对此，相关挽词中也有不少类似评判，如吴梅《水龙吟·古微丈挽词》云：“还是悲歌无地，结沅盟、沧江鼎沸。东华待漏，中兴作颂，纷纷槐蚁。忍泪看天，十年栖息，天还沉醉。算平生孤愤，秋词半篋，付人间世。”^[6] 林鹗翔《透碧霄》云：“剩飘零、吟社觥筹。便枉抛心力，词人一席，占断千秋。”刘肇隅《鹧鸪天》：“病榻恹恹忍乍分，词林坛席几曾温。蚕缲到死丝将尽，犹缱金门待漏恩。”“词人一席，占断千秋”已经够惊艳的了，然比之创作成就更高的评价则是人格定位。人们常将其与杜甫、屈原并论，突出其心系国家之忧，而终不被重用之怨，如张尔田《玉漏迟》云：“白头饱阅兴亡，又浅到红桑，海尘扬了。万里吞声，凄绝杜陵愁抱。”蔡嵩云《征招》云：“秋意，黍离深，词心远、恻恻杜陵声调。短棘早弥天，甚辽东名帽。”唐圭

璋云:“白头憔悴灵均,谁怜枉作词人。从此吴山越水,料应都带愁痕。”夏敬观《征招》云:“帝所奏钧天,唤颓魂不起。为君图玉笥,问谁识女罗山鬼。”简言之,彊村之高风亮节是受到词坛一致肯定的。

以上两点是彊村悼挽词的基本共性,也是民国词对历史的传承和题材范围的再拓展;而笔者更感兴趣的则是各作品之间所流露出的个性。

顺着上文人格定位的思路继续深究,问题就会迎面而来,杜甫和屈原“黍离愁抱”的对象是李唐和楚国,而彊村悼挽词中频频出现的“铜仙泪”“汉家陵阙”寄寓的山河破碎到底是哪个国?是已经覆灭的清廷,还是彼时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蚕食下的“民国”?对比洪汝闾《木兰花慢·挽溷尹社长》和夏承焘《征招·闻彊村先生十二月三十日上海讣,用草窗吊紫霞翁韵》两词,问题就会更加突出:

锦鲸仙不返,过茹雪,水云愁。正故国鹃啼,荒皋鹤怨,遗恨藏舟。繁忧暗凋鬓影,抚危阑身世寄商讴。一卷柴桑甲子,汉家残腊曾留。

神州。谁分陆沈休,往事泪难收。向野史亭边,月泉社里,几度盟鸥。山邱早拚共尽,有斜阳何处更登楼。剩得霜花句在,年年海上悲秋。

乍惊辽鹤尧年语,骑鲸又传仙杳。楚些漫相招,正昏昏八表。半生垂钓手,应不恋、棘驼残照。一暝同忘,九州幽愤,五湖高操。愁眺海东云,幽坊宅、花时梦游长绕。佛火数扬尘,念看桑垂老。鄮山青未了。更谁续、四明孤调?听鹃恨、怕有来生,奈暮年哀抱。^{[7](P16)}

前首“故国鹃啼”“遗恨藏舟”已明确暗示指清廷,“一卷柴桑甲子,汉家残腊曾留”更是很容易让人“联系到‘眷恋前朝’这一命题”^①;而后者“正昏昏八表”则指当下日军侵华的神州陆沉,“应不恋,棘驼残照”则指并不对清廷有太多留恋。一边是眷恋,一边是不恋,何以出现如此巨大反差?窃以为主要是创作者社会身份层面的遗民与新民之别,而解决此问题的过程,正是证明民国词独特个性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具体辨析一下悼挽词人对民国的政治认同。

根据生卒年来看,作挽词的26位词人大体可分

为两大群体:一是与朱祖谋年齿较为接近的出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群体,如潘飞声、汪兆镛、陈曾寿、廖恩焘、杨铁夫、洪如闾等,他们大都曾在清廷做官,或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民国后以遗老自居;二是19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者,多是彊村弟子晚辈,如邵瑞彭、陈匪石、龙榆生、寿铎、蔡嵩云等,他们多成长于清末民初之际,对民国认同感较强。当然其中也有交叉现象,如生活于清朝较长时间的廖恩焘(1864~1954)、夏敬观(1875~1953)等,民国后政治表现活跃,积极出仕;而历代受清廷垂青,有很深家族印记的郭则沅(1881~1947),年岁虽不大,却极力塑造遗民身份。正因为有错位交叉,他们词中叙述的异同更有典型性。遗民郭则沅《水龙吟·挽彊村词丈》更关注彊村在清廷时期的突出“功绩”,如“故国兵前,浮名梦后,料无回顾”^{[8](P2)},而新民夏敬观则聚焦于九·一八事变下的民国安危:“眼底破家山,空凭吊、凄凉故人身世。”廖恩焘《三部乐》也认为彊村能够适应清民时代的更迭:“凭阅尽、楸枰几局。兰佩自结,千秋下、人被芬馥。”将遗民与新民落脚点的差别放大到以上词人,则会更加清晰。先看遗民群体词作:

林鹂翔:“陆沈忧,廿年封泪与神州。抗颜有疏,回天无计,往事悠悠。文章羁旅,功名故国,身世浮沓。”

潘飞声:“河山犹剩铜仙泪,汉家陵阙愁无地。琴调水云寒,花前那忍弹。两朝传谏草,海角飘零老。我意比黄苏,诗中入境庐。”

周庆云:“涯一暝登楼眼,凄凉望京遗绪。故国几繁霜,忍声移宫羽。拜鹃心最苦,更幽咽笛边低诉,玉局添愁。金尊斟泪,恨留臣甫。”

杨铁夫:“老臣心词人一席。问百年垂死中兴,病榻几番寻觅。”

林葆恒:“江湖卅载,此去晞发阳阿,苍茫望眼中兴杳。苦语念真冷,尚拳拳忠孝。”

遗民群体悼挽时调动的素材,大都是朱祖谋为官礼部侍郎时对义和团事件的“抗颜直疏”。据李岳瑞《纪归安朱侍郎直言事》:“庚子拳匪之变,举国若

①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九云:“自前清革命,而旧日之官僚伏处不出者,顿添许多诗料。‘黍离麦秀’‘荆棘铜驼’‘义熙甲子’之类,摇笔即来,满纸皆是。”(见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38页)林立认为:“这些‘封闭性’极强的典故,除了联系到‘眷恋前朝’这一命题之外,就引发不出其他的含意。”(见林立《沧海遗音:民国时期清遗民词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52~353页)

狂，盈廷缄默，偶发谏言，辄触奇祸。其官居侍从，身无责言，而折角批鳞，终始不挠……首抗疏力争拳匪妖妄，不可倚以集事。”^{[9] (P157)} 需知彼时慈禧等已有借义和团剿灭外国入侵的双重算盘，朱祖谋此举难免有招致杀生之祸的巨大危险。遗民群体将此“抗颜直疏”作为疆村平生功业最称道事，反复提及，试图在追忆往事中抚慰他们自身“拳拳忠孝”的“老臣心”。

相同时空下的新民群体词则完全不同，其词更突出朱祖谋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忧虑，尤其是 1931 年受到外族入侵导致的“狼烟匝地”，民不聊生，如：

邵瑞彭：“严城鼓角夜三更，孤月此心明。话别殿春雷，空林夏雪，一例吞声。”

吴梅：“暮年萧瑟江关，举头惟见河山异。抗声殿角，回榭岭表，乱云如戏。”

蔡嵩云：“旅魂返，忍睇江山，剩晚鸦颓照。”
向迪琮《鹧鸪天》小序：“辛未残腊薄游海上，适值倭警，哭疆村翁不得，旅社凄黯，追和绝命词原韵。”

朱祖谋于 11 月去世，此时距离九·一八事变爆发已有数月，国内人民抗日情绪逐渐高涨，新民群体对此心声有清晰的反映，诸如“严城鼓角”“抗声殿角”“适值倭警”“忍睇江山”等等，完全抛开清廷故国，而着眼当下山河的现实危机。疆村仙逝成为他们歌颂英雄无畏之情，抒发爱国热情，宣扬积极抗战的新窗口。

综合以上分析，民国时期的悼挽词一定程度继承了宋词的基本范式，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回顾与主人的友谊之情；一是概括主人功绩，给出准确历史定位。但在此范式基础上，因创作者身份的差异，相同的疆村悼挽题材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情感寄托。带有遗民性质的群体更愿意歌颂朱祖谋为官礼部侍郎时“抗颜直疏”的佳话，以此彰显自身对故国的眷恋和忠贞，因而疆村去世的个人事件演变为遗民集体凭吊故国的公共事件。具有新民身份的群体更关注当下民国政治的动荡及未来的发展，他们急切地抒发内心的忧虑，希望以此引起世人对紧迫局势的关注。

同是悼挽疆村，之所以出现如此反差，不仅仅是因为凭吊者的身份差异，也是由于朱祖谋本身形象的复杂性。他一方面以遗老自居，常在词中表达故国忧思；另一方面又以积极向上的态度拥抱民国，并以勇于担当、奖掖后劲的盟主身份执掌诗词界，成为众多新锐眼中的恩师和榜样。这造成了以上悼挽词中的反差现象。窃以为，出现反差更本质的原因，是

人们低估了朱祖谋的真正价值。其显著表现就是词坛诸友并未透彻理解朱祖谋的心理诉求。请先看龙榆生悼挽词《莺啼序》下片：

巢穴未稳，旅魄旋惊，夜台尚碎语。咽泪叩天阍无计，道阻荒蒿，日宴尘狂，懒移宫羽。狼烟匝地，胡沙遗恨，他年华表归来鹤。望青山，可有埋忧处。伤心点笔，元庐早办收身。怨入历乱箫谱。流风顿歇，掩抑哀弦，荡旧愁万缕。漫暗省传衣心事，敢负平生，蠹墨盈笈，瓣香残炷，疏狂待理，深思何限。心期应许千劫在，怕共工危触擎天柱。萋萋芳草，江南戍角，吹寒下泉惯否。

龙榆生将问题引到了更深的层次，即朱祖谋“心期应许千劫在”中的“心期”到底是什么？龙氏《疆村晚岁词稿题跋》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先生病日笃，一日强起，邀予往石路口知味观杭州餐馆小酌，语及东北事，相对歔歔者久之。复低声太息云：‘吾今以速死为幸。万一逊帝召见，峻拒为难。应命则不但使吾民族沦胥，即故君亦将死无葬身之地。’嗣是遂卧床不能复兴。一日，予走谒先生于牯岭路寓楼，既出所作《鹧鸪天·绝笔词》见示，复就枕边取平生所用校词双砚授予，因曰：‘吾未竟之业，子其为我了之。’”^{[10] (P569)} 由此判断，其心期有二，一是校词“未竟之业”，一是东北伪满洲国逊帝召见之事。而后者“以速死为幸”的肺腑之言，是前者无法比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朱祖谋的去世，是病逝之偶然，也是“峻拒为难”下的必然。逊帝溥仪后来确实下诏召集前贤。与郑孝胥等名士在饱受垢议中还是投奔伪满相比，疆村的远虑是有先见之明的。其挣扎的心态反映的是整个遗民群体的共同困境，而其“未竟之业”又委婉地道出新民群体的家国之叹。

综上所述，由相同题材之疆村悼挽词中的不同情感寄托，引出的遗民词与新民词的叙述差异，所折射出的文化现象是值得反思的。悼挽词的大量出现，固然与战争等外部大环境有关，但其也是词体功能加强的表征，尤其是群体身份的异同，都可以借悼挽所寄托情愫的差异来体现。这更进一步突出了民国时期词体传承基础上的新特征。更重要的是，疆村悼挽词不甘于仅仅以悲痛指数或情真意切作为该题材的衡量标准，而是横向扩展到整体词坛两大群体之间的心态层面，从而得以彰显出民国词现代性的特殊品质。当然，其也为解决古典词与现代词过渡问题提出了值得参考的思路，即可从创作者的身份定位与政治认同来考量。

二、民国词中庾信意象的守正与开新

与从题材角度相比,更能凸显区域性词人书写差异的是相同意象的不同内涵。意象并不局限于景物,有些人物也可以成为意象,庾信就是典型代表;所不同的是,人物类意象的生成有着漫长的经典化过程。

唐宋诗词中使用庾信典故一般有两大意蕴。一是寄托人生愁苦。如杜甫《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哀伤同庾信,述作异陈琳。”韦庄《润州显济阁晓望》:“地壮孙权气,云凝庾信愁。”周邦彦《宴清都》:“宾鸿漫说传书,算过尽、千俦万侣。始信得、庾信愁多,江淹恨极须赋。”黄庭坚《减字木兰花》:“拂我眉头。无处重寻庾信愁。”庾信之愁怨,源于其于承圣三年(554年)出使西魏后被强行滞留,不得回乡。唐宋文人常借庾信之哀苦浇自己心头之块垒,古今链接的焦点在人生坎坷。二是单独抽绎出乡关之思的情感指向。这里也有两层意思。一方面是普遍的乡关之思,如赵文《莺啼序》:“肠断江南,庾信最苦,有何人共赋。天又远,云海茫茫,鳞鸿似梦无据。”另一方面则如吴先宁指出,其并非单纯怀念家国,而是对萧梁政权下贵族文化的怀念。引起唐宋文人共鸣的,正是个中希望获得朝廷肯定,并再次重用的隐微情感,如刘禹锡《荆门道怀古》:“徒使词臣庾开府,咸阳终日苦思归。”

明清易代之际,诗词中庾信典故的内涵有所增加。先看姜埰《广陵遇嘉禾友感赋》:“连岁丧亡哀白马,几年离别惨朱颜。娄东学士三词伯,身世伤心庾子山。”娄东三词伯即曹溶、吴伟业、龚鼎孳。曹溶是明崇祯年间进士,仕清后官至户部右侍郎、广东布政使。龚鼎孳仕清后官至礼部尚书。吴伟业仕清后为清国子监祭酒。姜埰诗歌中将三人和庾信相比较的节点在于他们都有一共同身份——贰臣。有些明清评论家对庾信行为十分鄙夷,如全祖望《哀江南赋后》云:“庾信之无耻也,失身宇文,而犹指祸首赐秦为‘天醉’。”^{[11](P1412)}可以推测,与庾信同时代的其他文人也会有相似的看法。所以,庾信在《拟咏怀》中多次述说自己不得已的苦衷:“燕客思辽水,秦人望陇头。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清初贰臣群体当然也饱受道德指责,所以他们诗歌中经常使用庾信典故,但其用意并非指人生际遇和乡关之思,而是庾信所谓的“倡家强聘”。其本质是为自己洗脱仕清后的道德污点。如龚鼎孳《赠歌者王郎南归和牧斋宗伯韵》其十二云:“烟月江南庾信哀,多情沈炯哭荒

台。流莺正绕长楸道,不放春风玉勒回。”又其《当入署日吏人以雨不至因复高卧漫成自嘲》其八云:“龙门秋涨勇,洱海战旗开。惆怅清光远,能宽庾信哀。”结合诗题及两首诗歌的尾句,我们能够清晰感知作者寄托“倡家强聘”的焦虑。类似表达,在其他贰臣诗中还有很多。

至此,诗词中的“庾郎”“兰成”“庾子山”“庾开府”等系列典故的内涵已经变得十分复杂。其既可以作为乡关之思,继而引申出人生愁苦的间接表达;也可以作为怀才不遇,希望东山再起的政治理想的传达;还有身为贰臣,为洗脱污点的隐微修辞。这些情感内容,不仅囊括了庾信自身坎坷遭遇的历史形象,也涵盖了其所塑造出来的文学形象。所以,清初时期诗歌中的庾信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意象。其实,庾信意象与历史人物之间本就是一个集合体,只是后世文人将其古今联通之时,作了有利于自身情感表达的单向拓展,而今典引申的意义,恰是文学传承基础上的创新之处。

晚清民国时期,战乱频发,庾信意象又在诗词中频繁出现,但作者所寄托的情感已经大为不同。以抗战词为例,其中出现了借庾信意象表达战乱悲痛和富国强兵的新内涵。如沈祖棻《浣溪沙》:

今日江南自可哀,不妨庾信费清才。吟边万感损风怀。应有笙歌新第宅,可怜烟雨旧楼台。谢堂双燕莫归来。

此处庾信哀伤意象出现反转,下片更是借“谢堂双燕”而道伤时感事之语。再如詹安泰《玲珑四犯》:“玉殿嘶狐,宫花围屐,江南哀赋无地。乱山腾野火,故国浮新垒。相看月明泪洗。惜分飞、寸心千里。泛海迷槎,叩阍无路,孤剑向谁是。”朱荫龙《金菊对芙蓉》:“几度劫,老人天。是忧谗意绪,总怕缠绵。况梦伤幽邈,约误婵娟。屈骚庾赋萧条甚,更为谁、料理词笺。无多豪泪,纵横挥入,恩怨间间。”这都是跳出庾信形象束缚,而自成一体的佳作。其中缪钺《念奴娇·寄友人沪上,时余自保定违难开封,而沪战方起也》更接近史的意义:

羯胡无赖,又群飞海水,欲倾天柱。十六燕云瓯脱地,赢得伤心无数。杜甫麻鞋,管宁皂帽,萧瑟兰成赋。凉飙惊起,晚花开落谁主。闻道佳丽东南,玄黄龙血,一掷成孤注。地变天荒心未折,薪胆终身相付。玉貌围城,哀时词客,健笔蛟龙怒。江干烽火,几回相望云树。

庾信“兰成赋”与“杜甫麻鞋”“管宁皂帽”相提并论,已清晰表明作者所取故国之悲的寓意。下片转

向对友人坚决抗战的赞赏。“地变天荒心未折，薪胆终身相付”是颇有豪侠气质，而不失粗率的英雄之词。卢前《减字木兰花·渡江赴无为，南望，不胜庾信之悲》则直白道出“都忘小我，到处为家无可……切齿深深，益固同仇敌忾心”的统一抗战之情。至此，国统区词人词作之庾信意象已由乡关之思上升到故国之悲，乃至坚定抗战必胜的层面，史的比重越来越大，开始跳跃出庾信本身形象局限，迈向取历史素材而自创新境的道路。

沦陷区词人则较为复杂，并非所有人都有“倡家强聘”之叹。尽管身陷“囹圄”，但词人们对投奔伪政府的行径是极力讽刺批判的，因而作品中常有勉励自身保持气节的决心。如黄孝纾《浪淘沙·白门秋感》：

万叶战荻声，雁起遥汀。秋来竞作不平鸣。
老去江关萧瑟感，愁损兰成。潮打石头城。
梦断春灯。更无人解泣新亭。一片秦淮呜咽水。
依旧无情。

执教伪政府大学的黄孝纾并没有屈服于“和平文学”运动，反而大言“不平则鸣”，描写金陵城“江关萧瑟”的真实情景。在枪炮生死面前，“无人解泣新亭”之下，黄孝纾的微弱呻吟显得十分珍贵。再如张伯驹《木兰花慢·题枝巢翁清官词》，将夏仁虎比作庾信，借《清官词》而大谈时事：

郁巫间莽莽。钟王气，定幽燕。看万国衣冠，六宫粉黛。歌舞朝天。无端。祸兴燕啄。竟河山大好误垂帘。鼙鼓惊残绮梦。胭脂染作烽烟。
长安剩粉拾钗钿。遗事说开元。似杜陵幽抑。颖川旖旎，花蕊缠绵。谁怜。北来庾信。有飘零前代旧言官。不见白头宫女，落花又遇龟年。

张伯驹的高贵是藏在骨子里的，他不会在诗词中咒骂贼人，即便是讽刺挖苦，也要显得有文艺范，词中“河山大好误垂帘”“胭脂染作烽烟”都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进行时；而“飘零前代旧言官”者，则是夏仁虎、张伯驹、郭则沄、俞陛云、张尔田等一批北平词人的共同写照。

沦陷区词人并不局限于一己身世之感，而是着眼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命运。如杨寿枏“青袍一例伤憔悴。似老去、庾郎身世。衰萤化碧照秋坟。是万古、伤心地”的悲悯，蔡嵩云“庾信生平，江淹才调。骚词半篋秋多少。……子规啼断巴山道。西河一泪洒人间，荆榛满地衰兰老”的沉痛，最伤心欲绝

者当属吴眉孙《永遇乐·读孟劬翁旧京近作，乱离身世，其音绝哀，和韵倚声，不胜依黯》：

白雁啼霜，苍葭隔水，书到秋馆。杼轴悲怀，琼瑰热泪，人共天涯远。文章才老，江湖岁暮，萧瑟庾郎禁惯。黯销魂，登楼北望，淡日冷烟遮断。莺花故国，欢场如梦，零落清商曲变。往事心头，模糊一醉，莫放闲尊浅。连床书卷，闭门风雪，白发青灯依恋。谁听哀弦夜弄，再三唱叹。

词笔末着抗战一字，而字字牵涉家国，深得《哀江南赋》神髓。

综上所述，唐宋诗词中的庾信只是作为典故使用，至清初贰臣诗出现后，其典故的内涵有所扩大，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逐渐生成为一种文学意象；晚清民国时期，庾信意象成为抒发国家沉沦之痛和坚定抗战必胜信念的新符号。意象内涵的传承，是古典诗词发展的正常赓续，而结合不同时代特点，丰富并拓其内涵，则是当代作家独辟蹊径，谱写新世纪诗词的重要途径。

以上分别以彊村悼挽词和庾信意象为例，分析了民国词对古典文学的继承与开拓。继承痕迹的追寻，是对民国词传统特征的挖掘；而开拓创新层面的探究，则是逐步建立民国词特质的新路径。只要我们立足作品，从文本中更多的细节之处切入，厘清传承与新变的具体表现，民国词的现代性特征就将会更加显著地呈现出来。

参考文献：

[1]马大勇.20世纪诗词史论[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
[2]胡旭.悼亡诗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
[3]刘斯翰.海绡词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张璋，职承让，张骅，张博宁.历代词话续编[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5]孙克强，杨传庆，裴哲.清人词话[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6]吴梅.霜厓词录[M].贵阳：文通书局，1942.
[7]夏承焘.夏承焘词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8]郭则沄.水龙吟·挽彊村词丈[J].国闻周报，1932(29).
[9]李岳瑞.悔逸斋笔乘[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
[10]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1]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特约编辑 赵家晨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